

江西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

——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段亚鹏, 林 磊, 张宇宁

(江西师范大学城市建设学院, 南昌 330022)

摘要: 通过多维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将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与地形地貌、水系河流等数据结合,分析各时期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状态;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时期空间分布密度有差异,整体从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散;在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下,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拔0~200 m的平原地区和200~500 m的丘陵地区,2°~10°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分布。该研究可对今后江西省文化遗产及遗产廊道的空间整合与协调发展等提供合理依据。

关键词: 江西省; 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时空格局;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K872; K92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16-0211-08

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事物和传统的文化形态,体现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知识、习惯等^[1-2]。我国通过“自上而下为主,兼顾自下而上”的保护路径,由点到面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实施分级管理^[3]。根据已有研究分析,国内学者主要以文物保护单位^[4-6]、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7-8]、非物质文化遗产^[9-10]为研究对象,从行政单元、江河流域、城市经济带等不同层面对文化遗产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并从自然地理、交通路线、社会经济等多角度解析其影响因素,系统揭示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与演变规律。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管理等方面,相关研究包括国内外遗产保护管理对比^[11]、文化遗产旅游响应关系的分析^[1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联动保护的构想^[13]、基于文化廊道视角的文化遗产保护空间的整体性构建^[14]等,体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刻变化与研究方向整体性、体系性和多元性的趋势,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特征。

作为一个地区可识别的表征化符号,江西省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以促进城乡人居环境发展、旅游规划等,而这是当前研究成果的薄弱之处。因此,本文运用多维地理信息

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对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分析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江西省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管理、利用与开发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丰富区域文化遗产体系研究成果。

1 研究区域概况

从地理区位来看,江西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完整的地理单元。“东接闽浙,西连荆蜀,被逾淮汴以达于京师,据岭海之会,斥交广之境”,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有与外来文化交融共生的过程,从所谓“蛮荒之地”逐步变成“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良好的气候、土壤和资源条件,相对较少的自然灾害,江西自古以来就是适宜农耕的鱼米之乡,特别是随着战乱等原因,大量北方居民连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入江西,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时间跨度的人类活动在区域内形成了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1~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和江西省政府公布的第1~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地理空间数据

收稿日期: 2024-06-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6803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1ZD01)

作者简介: 段亚鹏(1983—),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林磊(2000—),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张宇宁(1995—),男,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云 GDEM V3 30 m 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据;江西省行政区划、水系河流等数据。名录上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067 处。为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复时,保留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含有多处且地域分布跨越尺度较大时将文物保护单位拆分,最终得到研究样本共计 1 173 处。

2.2 研究方法

2.2.1 最邻近指数法

该方法通过计算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的比值,反映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在类型间进行比较,计算公式为

$$\bar{r}_e = \frac{1}{2 \sqrt{n/A}} \quad (1)$$

$$\bar{r}_1 = \frac{1}{n} \sum_{i=1}^n \bar{r}_i \quad (2)$$

$$R = \bar{r}_1 / \bar{r}_e \quad (3)$$

式中: $\bar{r}_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n 为数量; A 为面积; R 为最邻近指数。 $R > 1$ 时,分布趋于均匀; $R = 1$ 时,分布趋于随机; $R < 1$ 时,分布趋于集聚^[15]。

2.2.2 不平衡指数

该方法通过计算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占比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比例之和,描述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区域分布的不平衡关系,计算公式为

$$S = \frac{\sum_{i=1}^n Y_i - 50(n+1)}{100n - 50(n+1)} \quad (4)$$

式中: S 为不平衡指数; n 为分类个数; Y_i 为各地区占比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 S 越接近于0,空间分布越均衡; S 越接近于1时,空间分布越不均衡^[16]。

2.2.3 核密度法

该方法通过计算文物保护单位点的密度,可以识别文物保护单位在研究区域的集聚与分散状况,计算公式为

$$\int_h^\Lambda(x) = \frac{1}{nh^d}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5)$$

式中: $K\left(\frac{x-x_i}{h}\right)$ 为核密度函数; $h(h > 0)$ 为带宽; n 为空间单元内的数量; $x-x_i$ 为对象点*x*与估值点*x_i*间的距离; d 为数据维系^[17]。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空间分布类型

根据江西省历史文化的演变特征分为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5个时期,利用 ArcGIS10.2 计算最邻近指数和空间结构类型(表1)。有表1可知,各时期内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小于平均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小于1,空间分布类型表现为集聚型。其中,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最邻近指数最高,集聚程度最弱;近现代时期的最邻近指数最低,集聚程度最强。

表1 各时期文保单位最邻近指数及空间结构类型

时期	数量/个	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m	平均理论最邻近距离/m	NNI	Z得分	SST
史前至先秦	38	22 090.243 3	27 047.665 9	0.816 715	-2.161 468	集聚
秦汉至隋唐	73	20 493.132 7	24 537.694 4	0.835 169	-2.694 201	集聚
宋元	115	15 597.950 9	21 931.145 0	0.711 224	-5.924 358	集聚
明清	421	7 263.133 4	12 204.357 5	0.595 126	-15.892 476	集聚
近现代	526	5 685.690 1	10 868.823 7	0.523 119	-20.923 465	集聚

注:最邻近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空间结构类型(space structure type, SST)。

3.2 空间分布均衡性

根据式(4)得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不平衡指数 $S=0.392\ 68$,表明其在内部分布不均匀。结合洛伦茨曲线,可知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赣州、吉安、九江、上饶、宜春、抚州等地,占总数的82.61%。

3.3 时空分布密度特征

对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核密度分析并生成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时期的核密度分布图(图2)。将文物保护单位分为6种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表2),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核密度分析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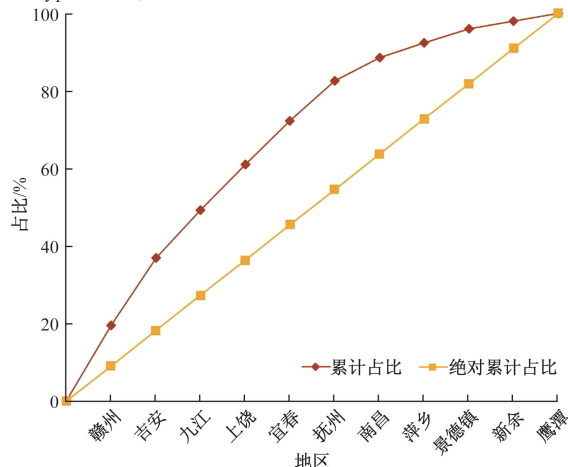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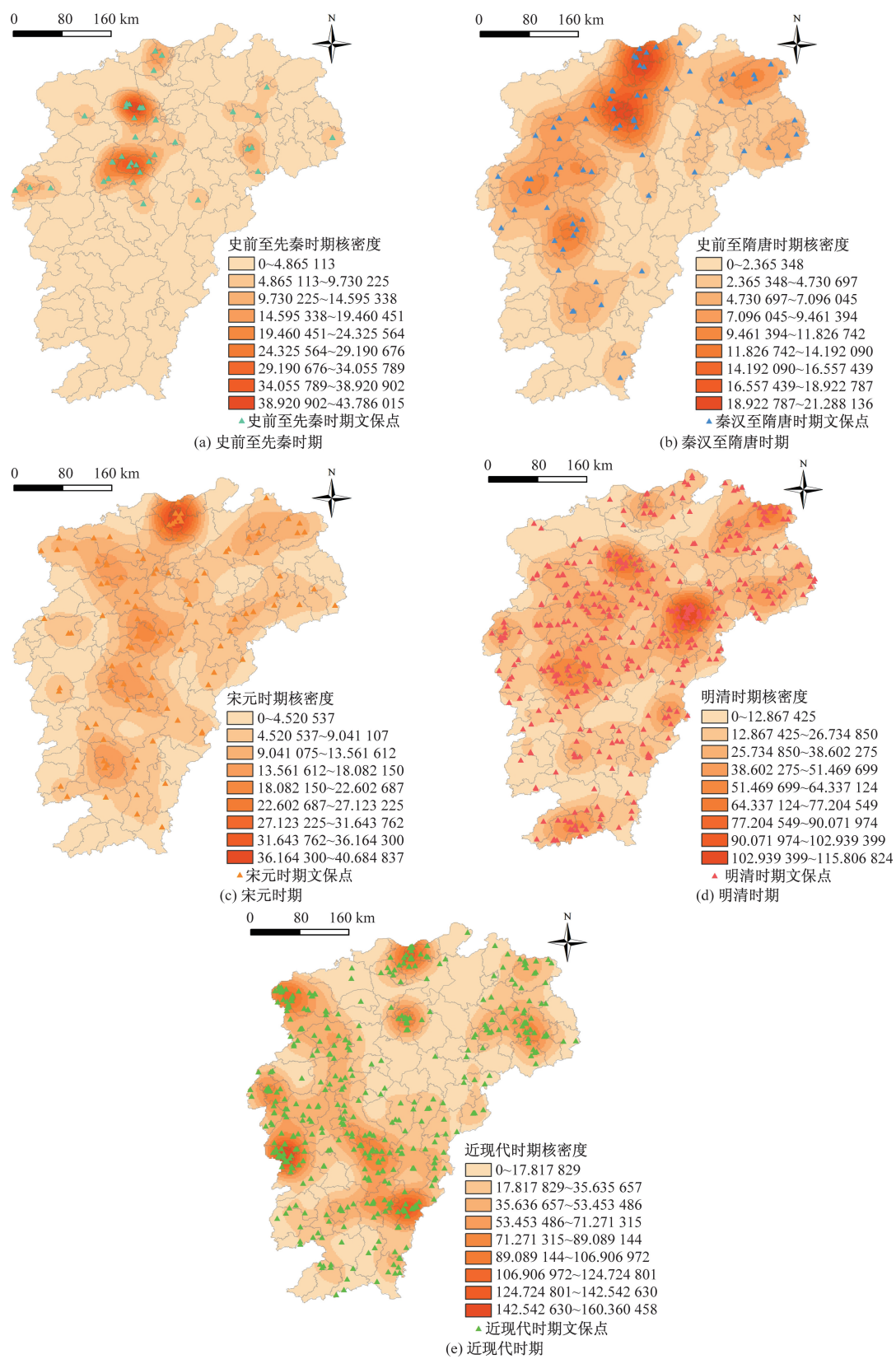


图1 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洛伦茨曲线



基于赣 S(2019)095 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2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布

表2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不同类型数量统计

类型	古遗址/个	古墓葬/个	古建筑/个	石窟及石刻/个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个	其他/个	总计/个
史前至先秦	33	4	0	0	0	1	38
秦汉至隋唐	20	15	28	8	0	2	73
宋元	23	18	49	24	0	1	115
明清	11	26	364	15	3	2	421
近现代	0	0	0	1	520	5	526
总计	87	63	441	48	523	11	1 173

3.3.1 史前至先秦时期

该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3个次核心区,主要集中在赣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以清江盆地的樟树和丰城地区以及鄱阳湖盆地西侧靖安、奉新和安义地区分布最为密集,九江、万年和萍乡地区为次[图2(a)]。早期人类活动在江西的历史极其久远,在安义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距今约有50万年。以鄱阳湖为中心,由长江和赣江水泥沙沉积而成的鄱阳湖平原面积广阔,土地肥沃,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商周时期,出现以吴城遗址为中心的早期国家形态,同中原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使该地区一跃成为江南青铜王国,同时也是江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遗址,出土遗物种类十分丰富。春秋时期,江西作为粮食主产地和必争之地,先后分属吴、楚、越三国,有“吴头楚尾”之称,当地的百越民族开始与华夏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18]。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类型是古遗址,共33处(表2),进一步反映该时期区域内的中心城邑聚落和早期国家主要分布在江西北部的赣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

3.3.2 秦汉至隋唐时期

该时期有2个核心密集区和2个次核心区,集中在鄱阳湖周边平原、吉安盆地以及清江盆地地区,初步形成沿大庾岭-赣江通道分布,以九江地区最为密集[图2(b)]。秦汉至西晋时期,江西先后设立豫章郡、江州,完成了“化外”到“化内”之区的转变,文化载体与政区格局初步形成^[19]。魏晋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给江西带来了大量北方移民,江西进入大开发时代,逐步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第三大经济中心,至南朝时成为江南稻米重点产区之一^[20]。同时,纺织、制茶、陶瓷、矿冶等产业的异军突起,使江西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时期江西由贫穷落后走向大开发、大发展,承前启后,为江西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兴盛奠定了牢固基石,江西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开启中国

历史上的“江西时代”^[21]。另外,大庾岭-赣江-鄱阳湖-长江这一黄金水道的畅通,诞生了江西历史上第一批商业性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迹。该时期以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建筑居多(表2),由于稳定的政治格局,繁荣的商业和第一次北人南迁等,极大地促进了江西的发展和多元民族文化交流,达到历史的第一个空前繁荣期。

3.3.3 宋元时期

该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和3个次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大庾岭-赣江沿线与赣江支流流域,仍以江西与长江交界的九江地区最为密集,但密集程度不及从前[图2(c)]。在成为全国十道之一的江南道后,江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拉开第一次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序幕,进入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居各路前茅,是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之一,出现“满朝文武半江西”的局面^[22]。大庾岭驿道的进一步开拓,与四通八达的水系结合,形成沟通江浙、闽粤和湖广各地的交通网络。同时,江西在文学、艺术、经济、教育等方面撑起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有“两宋文人半江西”“宋代科学半江西”之称。另外,作为宗教中心、文化圣地以及旅游胜地,江西的名山大川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因此,该时期以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居多,数量占比达到83.5%(表2)。

3.3.4 明清时期

该时期有1个核心密集区与4个次核心区,其中核心密集区转移至赣东地区,次核心区为大庾岭-赣江南北要道沿线的南昌、吉安、赣州三地与赣北地区[图2(d)]。明清时期,江西传统经济趋于极盛,但该时期末江西地区饱受兵燹之厄,人口骤减且恢复缓慢,再加上自然灾害与移民活动,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如“樟树、吴城最盛之埠,商业已十减八九”^[23]。相比之下,赣东地区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取代大庾岭-赣江南北要道沿线区域成为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为密集的区域。该时期星罗棋布的建筑遗存不仅是江西地区人文鼎盛的见证,也

是村落民众经营内心自我的精神空间和反应。抚州金溪县方珂廷“遐贾吴、越、淮,不三年,发家数百金,乃归构舍宇”,宗族传承的稳定形成了该时期文以古建筑与古墓葬为主的格局,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表 2)。

3.3.5 近现代时期

该时期主要沿省域边界山区多中心分布,主要集中在早期革命的萌芽地区以及江西的五大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瑞金、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图 2(e)]。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九江开埠,吴城、樟树等商业中心迅速衰败,传统经济难以发展,九江则一跃成为江西第一商埠、唯一的进出口基地和最大的物流中心,迅速成长为长江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江西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从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到秋收起义的策源地,从八一南昌起义军旗升起的英雄城到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从瑞金红色故都到赣东北苏维埃模范省,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取得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硕果。由于历史、地理、政治条件,江西山区建立了早期的革命根据地,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与旧址,丰富了红土地的内涵。由于近现代江西的革命背景,形成了五大革命根据地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的分布格局,在各时期中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最多(表 2)。

4 影响因素

4.1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基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地理环境要素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对聚落选址、道路交通、人口流通等也产生不同的制约作用,深刻影响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分 布^[24]。本文研究的地形地貌因素主要包括海拔和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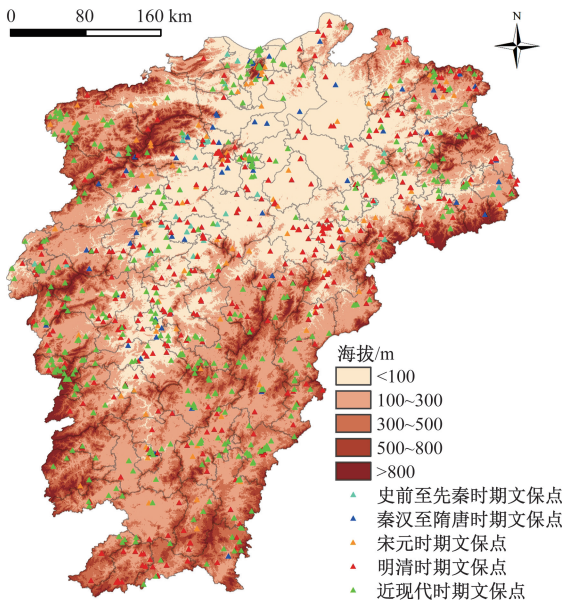
4.1.1 海拔

海拔是地形地貌的重要影响因素,海拔差异衍生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进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15]。将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与地形高程叠加(图 3),可知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分布在平原和丘陵地区。这是由于江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不属于兵家必争之地,政治环境稳定,并先后接受了两晋永嘉之乱、唐末安史之乱和两宋靖康之乱的三次北人南迁的移民,极大地助力了江西山区的开发。另外,在优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下,江西地区人文兴盛,产生了陶渊明、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黄庭坚、朱熹等历史名人,留下了丰富

的文化遗产^[25]。按海拔划分的标准(表 3),文物保护单位大多位于 0~200 m 的平原地区和 200~500 m 的丘陵地区,占比达 94.03%。这是由于江西的平原地区气候温和、水系发达、适宜人类居住,人文活动兴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丘陵地区则是由于近现代江西地区作为红色故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精神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4.1.2 坡度

坡度以坡面的垂直高度与水平距离的百分比定量描述表单元的陡缓程度^[26]。将坡度分为 6 个等级与文物保护单位叠加(图 4)并提取坡度数据,统计各坡度区间的数量(表 4)。可知随着坡度的增大文保单位的数量先增加后减少,且主要分布在 2°~10°的坡度区间。从不同类型来看,坡度≥25°的文保单位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及石刻两类为主,这与战争的特殊性以及石窟及石刻载体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有关。古建筑类在宋元时期海拔分布最低,这与该时期江西经济社会进入繁荣兴盛期有关,且多见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水陆交通要道。古遗址类包含的时间跨度最大,其中秦汉时期



基于赣 S(2019)095 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3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高程海拔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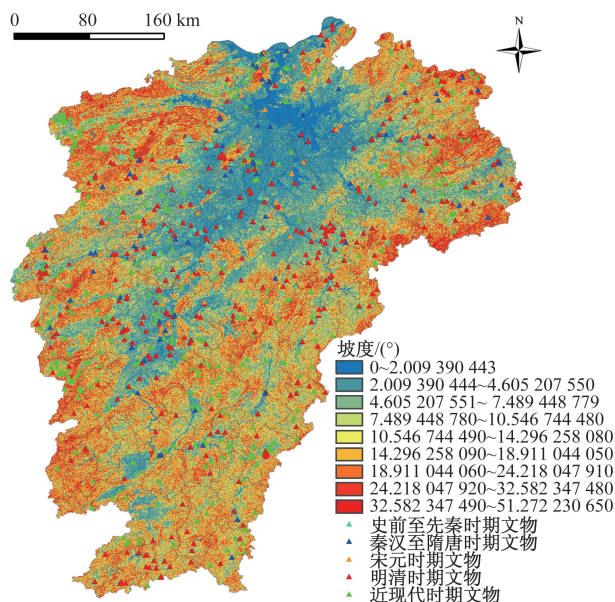
表 3 各时期不同高程海拔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海拔	<100 m	100~300 m	300~500 m	500~800 m	≥800 m
史前至先秦	27	11	0	0	0
秦汉至隋唐	38	28	3	2	2
宋元	55	42	8	3	7
明清	220	147	33	14	6
近现代	160	256	75	21	15

以后大多为窑址、矿址,与早期人类史前活动遗址并不相同,坡度大小也有所差异。古墓葬类在史前至先秦时期的坡度最低,这与早期人居活动范围受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有关。整体来看,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坡度 $<15^{\circ}$ 的樟树、吉安、南昌等平原地区;而坡度 $\geq 15^{\circ}$ 的文化遗产则在东部仙霞岭-怀玉山,中部于山-玉华山,西北幕阜山-九岭山、南部大庾岭-九连山一带有集中趋势。

4.2 水系河流

将江西省水系河流与文物保护单位叠加(图5),统计其与水系河流的最近距离(表5)。由表5可知,84.48%的文保单位在距水系河流2 km以内,仅有2.73%的文保单位与水系河流的最近距离在5 km以上。贯通南北的赣江流域以及鄱阳湖周边的文保单位最多,历史跨度最广。鄱阳湖与西北部幕阜山-庐山交界处分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最密集,其次还有三个较为密集的文物保护单位集聚区,时期以近现代为主,分别是位于赣江支流禾河源头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区域、赣江支流绵江源头的共和国



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坡度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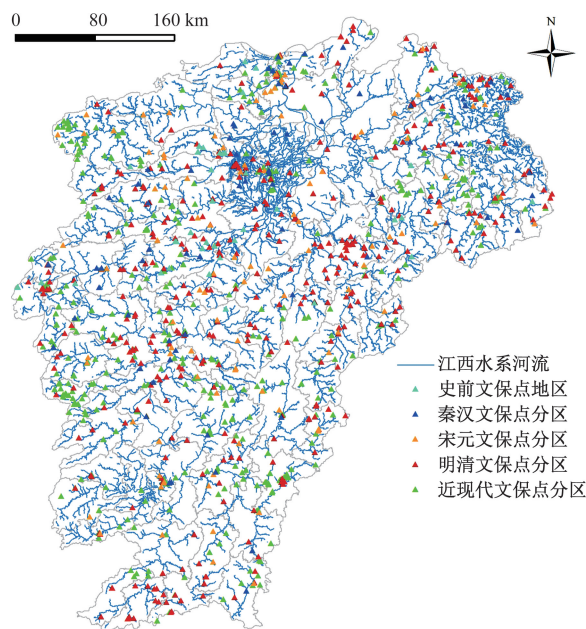
表4 各时期不同坡度区间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坡度	$<2^{\circ}$ / 个	$2^{\circ}\sim$ 5° /个	$5^{\circ}\sim$ 10° /个	$10^{\circ}\sim$ 15° /个	$15^{\circ}\sim$ 25° /个	$\geq 25^{\circ}$ / 个
史前至先秦	5	21	5	4	2	1
秦汉至隋唐	10	12	26	13	9	3
宋元	8	37	29	17	20	4
明清	52	129	109	59	54	17
近现代	37	143	153	75	80	39

摇篮瑞金以及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八一起义所在地南昌市区。此外,清江盆地中袁江与肖江交汇区域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史前遗址群,是中国南方早期人类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整体而言,高度发达的水系河流带来交通的便利使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沿水系河流高度聚集,同时也逐步拉开了与水系河流的绝对距离,表明随着文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活动逐渐克服水系河流带来的限制。

4.3 交通

交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不仅推动社会的前进,也为文明传播提供有利的条件。秦汉时期,攀越五岭的“通南越道”和自信江、盱江上溯进入福建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古代江西的道路骨架;至宋代,沟通江西与邻省的关隘都已打通,通往邻省的驿路数量也增加多条,道路网更加完善;明清时期,明代以经过江西的3条贡道为往来必经通道,清代以8条主要驿道和35条主要铺路联络省内外,大路程合计约为13 392里(1里=500 m),小路



基于赣S(2019)095号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5 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与水系河流

表5 各时期与水系河流不同距离下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距离	<0.5 km	$0.5\sim 1$ km	$1\sim 2$ km	$2\sim 5$ km	≥ 5 km
史前至先秦	18	11	6	3	0
秦汉至隋唐	29	19	12	10	3
宋元	44	28	25	14	4
明清	181	81	102	45	11
近现代	200	112	123	78	14
占比/%	40.24	21.40	22.85	12.79	2.73

里程合计约为 12 877 里^[27]。江西道路网系统随历史发展日趋完善,自秦汉时期形成道路骨架到近现代时期交通网密布,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上也遍布全境。因此,南昌、九江、吉安、新余、赣州地区由于交通条件自古以来就较为发达,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沿交通线路较为集中。

4.4 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因素

江西文化诞生于大江大河、大湖大山之间,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源远流长又自成一体(表 6)。自古越先人起,江西就有民风沉淀于斯,继而荆楚与吴越文化杂染其间,多次北民南迁将中原古风与江西故风交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江西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造就独特的赣文化,虽“大不如吴,强不如楚,然有吴之文而去其靡,有楚之质而去其犷”^[18]。近现代时期的百年抗争孕育了红色文化基因,积极的革命活动也给江西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迹。总之,在历史变迁背景下江西形成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不同类型、数量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第一,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各时期的最邻近指数 R 均小于 1,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

集聚状态。

第二,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平衡指数 $S=0.392\ 68(0<S<1)$,反映文物保护单位地域分布的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赣州、吉安、九江、上饶、宜春、抚州等几个市。

第三,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密度分布有较大差异,整体上从赣北的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散;史前至先秦时期有 2 个核心密集区和 3 个次核心区,主要集中在赣江下游地区和鄱阳湖平原的边缘地区;秦汉至隋唐时期有 2 个核心密集区和 2 个次核心区,集中分布在鄱阳湖周边平原、吉安盆地以及清江盆地地区;宋元时期有 1 个核心密集区和 3 个次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大庾岭-赣江沿线与赣江支流流域;明清时期有 1 个核心密集区与 4 个次核心区,核心密集区转移至赣东地区;近现代时期沿省域边界山区多中心分布,主要集中在早期革命的萌芽地区和江西的五大革命根据地。

第四,由于受地形地貌、水系河流、交通、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大多位于 0~200 m 的平原地区和 200~500 m 的丘陵地区, $2^{\circ}\sim 10^{\circ}$ 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分布。

5.2 展望

通过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模式及影响因子的研究,可以揭示其演变规律,进而指导文化景观分区建设、遗产廊道划分等相关工作,并明确其与周围环境要素的关联性,对推动其整体保护和利用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为万里茶道、长征线路、湘赣古道、徽饶古道等江西省域内一系列文化遗产廊道的研究提供借鉴,并为不同遗产廊道线路间的保护利用、空间整合、范围界定及地区风貌特征保护等提供参考。同时,对跨省域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开展以及自然风貌与文化特征整体关系协调,对延续地域文化与景观特征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等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的总体定位下对江西省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进行整体统筹、进入建设文化与自然魅力彰显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单霁翔.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J]. 城市规划, 2007(5): 9-23.
[2] 王永友, 骆丹. 习近平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论述研究[J]. 文化软实力, 2023, 8(2): 14-22.
[3] 董莉莉, 杨兆奇. 对于我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现实

表 6 江西省各时期事件

时期	事件
史前时期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群(吊桶环、仙人洞遗址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群(拾年山文化、山背文化、筑卫城文化等);
	青铜文化遗址(吴城文化、新干大洋洲、牛头城、瑞昌铜岭等方国文化/早期国家)
先秦时期	铁器文化出现,民族融合初始阶段(楚、吴、越),江西儒文化出现等
秦汉时期	江西地区纳入郡县体制、开始兴修水利、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佛教传入、本土道教形成、修建赣江-大庾岭商道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大开发时代、出现江西文坛奠基人(陶渊明)、瓷文化兴起等
隋唐时期	扩建赣江-大庾岭商道、书院文化形成并兴起、佛教道教兴起、茶文化兴盛、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等
宋元时期	种茶成风,书画鼎盛时期,江西理学、心学(陆九渊),经世致用思想,风水堪舆盛行,商帮兴盛时期,江西词派(兴于五代,盛于两宋)等
明清时期	商帮由盛转衰时期,人口外迁(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太平天国运动,王学(王阳明),戏曲文化(汤显祖)等
近现代时期	红色文化、秋收起义、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与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众多革命根据地等

- 问题的思考[J]. 青岛理工大学学报, 2010, 31(3): 42-46.
- [4] 何峰, 史太润, 张诗语. 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4): 217-228.
- [5] 余熠, 徐卫民. 甘肃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及其成因[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3(3): 413-422.
- [6] 李易诚, 孟万忠, 王庆伟. 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19): 42-49.
- [7] 董钰, 姜岩, 冯锐. 西安市历史村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2, 38(4): 435-442.
- [8] 陶洁怡, 董平, 周年兴. 长江经济带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3): 66-73.
- [9] 张涵, 刘会成. 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2, 41(6): 93-98.
- [10] 慕石雷, 元志辉, 乌日陶克套胡.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J]. 中国沙漠, 2022, 42(6): 255-265.
- [11] 高洁. 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1.
- [12] 闫旭纲, 宁玉杰, 王雨婕. 山西省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研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科技和产业, 2023, 23(22): 169-175.
- [13] 李卓一, 李建华. 文化空间类非遗的空间画像及与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动保护初探——以无锡惠山庙会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2): 162-167.
- [14] 王海英, 陶犁, 李云涛. 文化廊道视角下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空间整体性构建研究[J]. 地理研究, 2023, 42(10): 2622-2643.
- [15] 岳菊, 戴湘毅. 京津冀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2): 221-230.
- [16] 金爱博, 张诗阳, 王向荣. 浙江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联研究——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中国园林, 2022, 38(9): 22-28.
- [17] 周成, 柳炳华, 张旭红. 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沙漠, 2021(6): 10-20.
- [18] 彭适凡. 江西通史 1 先秦卷[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卢星. 江西通史 2 秦汉卷[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周兆望. 江西通史 3 魏晋南北朝卷[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21] 陈金凤. 江西通史 4 隋唐五代[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 [22] 方志远, 孙莉莉. 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52-61.
- [23] 黄志繁, 杨金鹏. 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社会重建困境与近代江西经济衰落——以人口、捐输与厘金为中心[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36(6): 123-129.
- [24] 孙军涛, 牛俊杰, 张侃侃. 山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 人文地理, 2017, 32(3): 102-107.
- [25] 刘子铭, 吴思雨. 江西历史名人时空分布格局特征分析[J]. 江西科学, 2021, 39(3): 498-505.
- [26] 许丽, 李江海, 刘持恒.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可可西里地貌及区划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53(5): 833-842.
- [27] 张天佑. 江西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近代公路[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 [28] 郭宏琴. 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9.

Spatial and Temporal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xi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DUAN Yapeng, LIN Lei, ZHANG Yuning

(School of City Construc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GIS spatial analysis, the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and the data of topography, water system and rivers were combined, and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was analyzed in each period. The study shows that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are concentrated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va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spreading to the whole provi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factors, most of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are located in plain areas at 0~200 m and 200~500 m with 2~10° slope and distribution along river system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 reasonable basis is provided for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heritage corridor in Jiangxi Province.

Keywords: Jiangxi Provinc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